◆观 点

最重要是让企业成为真正市场主体

近一段时间以来，先后有多名国企高管落马。大力反腐、深挖蛀虫，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但是，“挖虫”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要通过“挖虫”，改善国企的生存土壤和生态环境，防止新“虫”再生。

自反腐力度加大，特别是开展专项巡视以来，国企的腐败和违法乱纪问题，终于被揭开了，且越揭越深、越揭越令人震惊。几乎所有问题都直指向一个焦点，国企的体制和机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再发生。

有人说，改革是改变国企生存土壤和生态环境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紧迫的手段。这话不假，前提是，改什么、怎么改。从已经进行过改革的央企和地方国企来看，由于改得不彻底或为改革而改革，效果并不好。相反，却留下了许多新的漏洞，造就了许多新的腐败问题。

很显然，要想使国企不再成为腐败问题的“高发区”“重灾区”，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是最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腐败问题的发生，都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有关。

首先，经营者仍然由政府任命，企业董事会也好、市场也罢，对经营者都毫无约束力。也就是说，经营者干得好坏、有没有问题，董事会说了不算，而由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说了算。自然，经营者也就不会对董事会、对企业、对员工负责，而是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了。

其次，董事会形同虚设，多数决策都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所谓集体研究、集体决策，根本起不到约束和监督作用，出现决策失误和腐败也就不可避免了。相反，如果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具有约束和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权力，那么，很多失误和损失也就可以避免。

再次，监督完全失控，无论是外部监督还是内部监督，都在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无法形成的情况下，失去了制衡作用，导致从企业经营者到各个环节，都存在大大小小的腐败问题。一些企业在专项巡视中被挖出“蛀虫链”，就是最好的例证。

毫无疑问，要想通过改革解决国企的腐败问题，就必须把如何确立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对国企进行改革，让国企不再受制于政府、受制于行政权力，甚至受制于个人或少数人，而一切服从市场、服从法律、服从规则。第一，要让董事会成为企业真正的决策机构，并能够按照企业需要向市场公开招聘经营者，决定经营者的去留，而不是受命于政府；第二，企业的重大决策、重大投资、重大事项等，只能由董事会决定，必要时交股东大会讨论，政府无权干预；第三，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等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对企业的决策等提出异议，对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第四，相关职能部门有权按照法律规范对企业进行监督，对问题进行查处；第五，工会的法律地位应当进一步加强，员工对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工会反映，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经营者的履职情况进行评议。

一旦这样的格局形成，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问题漏洞也会减少。那么，反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挖虫”之后也就不用担心有新“虫”再滋生了。即便有新的“虫”滋生，也因为土壤和环境不同了，难以生存下去。（2015年4月10日《经济参考报》谭浩俊）

农业保护区制度仍需完善和配套

我国农业经济面对的深刻矛盾，是农业高成本所产生的农产品减产因素与国家确保农产品增产目标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立足于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现这个目标要克服多种困难，其中之一便是解决我国优质农地相对稀缺的问题。

新的农地保护制度设计要以“简单易行，放控明确；制度统一，权力分置”为原则。

农业保护区是指国家划定的农业发展的专属区域，它由国务院按照农业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确定总规模并批准设立，由县级人民政府直接管辖。农业保护区内禁止发展任何非农产业，可以接待游客，满足游客度假观光需求，但不得建设住宿设施。

如果实行农业保护区制度，我国土地资源总量中的农区面积会稳步扩大。我国有约60亿亩的国土适合发展有竞争力的农业。若划定25亿亩农业保护区，去掉约15%的河湖、道路、小面积陡坡地、农舍以及森林占地，估计有约21亿亩的可用农地。如在黄土高原地区、东北地区除上述类型占地之外，可以悉数划为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之外的35亿亩国土，去掉现有城市建成区、工矿区以及非保护区的村庄占地共约4亿亩，再去掉河流道路占地约4亿亩，考虑森林的远景占地20亿亩，还有7亿亩的余量，可适度扩大城市用地、发展广义的都市农业、安排中高端住宅用地。这样一个土地资源使用格局，足以满足未来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土地的需要。

农业保护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需有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

第一，下放土地管理权限。对农业保护区以外的其他土地，中央政府可将管理权限大幅度下放给地方。在相关法律修改之前，中央政府可授权省级政府国土部门代行中央政府权力。中央政府对农业保护区的土地规划与开发整理应直接管控，同时对其他类型土地的利用进行“目标指导管理”。

第二，以农业保护区发展为核心，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农村土地整理资金集中投放于农业保护区。农业保护区之外的户籍农民不再享受各类农业补贴，但暂时实际经营农业的农户除外。允许地方政府将节约资金在农业保护区建设工作中统筹使用。

第三，建立“注册农业经营者制度”。注册农业经营者分为“公司法人农业经营者”“合作社法人农业经营者”“自然人农业经营者”，后者主要为家庭农场。支农政策对这三类应分别对待。

第四，扎实推进农村产权改革，落实中央关于农民土地承包权确权颁证的工作。

第五，国土资源部试行的“增减挂钩”政策继续执行，可考虑转化为一般性政策，但对具体规定应作出调整。在农业保护区内，不得建设新的集中居住社区，应允许专业农户或家庭农场主分散居住。专业农户需要建设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农庄，只能在保护区内部的村庄占地上安排。对于自愿迁出农业保护区并将宅基地复垦的原住农户，其出让宅基地的补偿标准，要参考城市建设用地的出让价位。城市建设用地因增减挂钩政策得以扩大时，应将一部分溢价收入用于农业保护区建设。

第六，试行农业经营者规模管理政策。区别不同品种、不同生产方式，确定农业经营者的最大规模，具体标准由地方政府作出规定。

第七，适当调整地方行政区划。支持农业主产区的小县合并为大县，或建立专门的管理区等，以提高农业县的财政脱困能力。

第八，在放活地方用地自主权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城市建成区（包括工矿区）经济密度进行监控，制定监控指数，建立预警信息发布机制。（2015年第4期《中国国情国力》党国英）

◆纵 横

做好“围墙”外的事

杭州市委原书记王国平近期应邀来武汉演讲。由于在他主政杭州的十年间（2000—2010年），声名赫赫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在那里经历了从草创到壮大的过程，因此王国平不免再次回答了“杭州市是怎么培育出阿里巴巴的?”的提问：阿里巴巴并非政府有意培育，它不过是广种薄收的产物。

王国平回忆起1999年阿里巴巴还只有18名员工时的情境。面对马云当时拍着胸脯的豪言壮语，“好多人都说马云是疯子、骗子，但政府还是支持他”。不过王国平强调的是，所谓支持，并非外界所想象的拔苗助长，而是让阿里巴巴自己在市场上打拼成长。

王国平说，政府只是要做好“围墙”外的事。具体说，即是优化城市环境，包括生态、硬件、服务、法治、治安等各方面的环境。

不妨仍以“围墙”说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许多地方政府是直接进到企业的围墙内“大有作为”的。大大小小的厂长经理们内心里虽不以为然，表面上也不得不作言听计从状。其时政府领导“蹲点”指导的企业一个个作为“典型”见诸报端，好是热闹，只是不出三五年便昙花一现，不知所终。

再往后，政府虽不再直接进到企业的“围墙”里，却在那“围墙”周边布下关卡，企业上个项目、进口个生产线，甚至产品定个价格都要层层审批。企业经营者要想走出寸步难行的困境，非长袖善舞、层层打点不可。

回顾这些，不过立此存照，若能温故知新，更是求之不得。以前观察哪个城市有多少名牌、名企，多把眼光聚焦在企业家身上。现在看来视角多少有些问题。政府做不好“围墙”外的事，自然吸引不到马云及阿里巴巴们。（2015年4月2日《长江日报》梅明蕾）

重振中国制造关乎国计民生

国务院近日发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工作要点，要求深入推进法规和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和集中整治，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构建社会共治格局，营造公平竞争、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强调开展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对出口非洲、阿拉伯、拉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商品，开展专项整治，建立健全跨境执法协作机制。

中国虽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制造实在很难与之相匹配。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达与否的重要因素。而在部分人士的眼中，中国制造差不多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年前年后中国人在海外的“狂购”热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媒体报道，春节期间在羽田机场的免税店里，一位购买了电饭煲的30多岁中国女性一语道破了中国人“狂购”现象背后的本质，“在日本卖的肯定是正品。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产品许多都是假冒的，没有保证”。中国产品在美国、俄罗斯及西欧的遭遇，我们暂不忍心去面对，有太多的实例。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以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了为推动产业升级而准备实施的十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这是时势所迫，亦是民众的迫切要求。

深究中国制造沦为劣质产品代名词的背后，其每一个缘由都是触目惊心。其一，制造业“虚脱”现象严重。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实体经济与制造业，但在房地产业泡沫式发展的10余年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被耽搁了，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失衡。其二，专业化程度低的同时，仿冒产业却大行其道，大发不义之财，既侵犯了知识产权，又妨碍了技术创新与进步，还让中国制造在国内外成为了过街老鼠。对法制与市场环境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地重创了市场经济的根基。

中国一直被假冒伪劣所害，并祸及国外。现在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中国人在海外的“狂购”也对中国政府和制造业人士造成了危机感，但仅有危机感是远远不够的。有网友指出，海关、制造商、消费者、监管部门，步调要一致，多管齐下，重拳治乱，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制造等于劣质产品的不良形象。诚哉斯言！不严加整治，后果不堪设想，而质量的提升、诚信的建立，又是任重道远，但我们没有选择。

重振中国制造的声誉，不仅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亦关乎国家形象，更关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培育。提高产品质量、鼓励科技创新，与打击假冒伪劣、建立法治环境，必须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而这些，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体人民的责任。（2015年4月10日《三湘都市报》吴晓华）

◆评 论

政府在劳动关系上的作为和限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

众所周知，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唯因其重要，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就不仅仅事关劳资双方的切身利益，而且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

当下劳动关系中的一些未必和谐的现象，《意见》中已经给予了归纳。而纵观这些现象，反映出来的实际是一个问题，即在当前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地位过于弱势。2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10起劳动关系的典型案例，案例中暴露的劳动用工领域中存在的就业歧视、恶意欠薪等现象让人触目惊心，而就在最近，河北沙河市交警大队的15名女警工作20年未签劳动合同，工资常年低于全省最低工资，也不得不走上法庭。

劳动者地位之所以长期处于弱势，其形成原因颇为复杂，或许只有把它放到中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中考察，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本次《意见》中又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明确要求，其释放的信息十分清晰，这就是较之以往，未来中国将把劳动者的权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正如专家所说，《意见》的出台有明显的时代意义，现在经济高增长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劳动关系复杂。另外，政府也有意强调对劳工过去欠账的强化。过去相对来说对经济增长关注得多，现在社会建设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关系也属于社会建设这个范畴。

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毫无疑问，首要的一点，是需要尽快结束“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要做到这一点，政府扮演的角色堪称关键。而论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则不外乎两层：一是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健全的情况下，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过去许多劳动关系案例警示，政府部门依法捍卫劳动者权益的力度过软，这应该是一个教训。二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劳动力的价值增长了20倍，而资本的增值是2000倍。这样一种现状肯定不利于劳动者从其职业中获得尊严，劳动关系又如何能够和谐？

终结“强资本、弱劳工”，政府必须有为，但有为也应依法，需要恪守一定的边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需要硬起来，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可以侵害企业的自主权。曾经有地方法规规定禁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行经济处分，殊不知不论是《劳动合同法》，还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都已说明，用人单位可以制定包括经济处罚在内的规章制度，只是其前提在于企业的规章制度合法，并且得到劳动者的同意。实际上这也是发达国家企业制定规章制度的通例。在这样的通例里，企业的自主权得到了保障，但又不能无度使用，必须受法律的制约。

劳资双方始终是劳动关系中确定无疑的主体，让他们的关系从“规范”到“和谐”，法律的规制当然不可或缺，但市场的力量终究不可小视，而且社会越向前发展，观念的作用更会凸显。当资方意识到让劳动者收获尊严和快乐必将让自己得利时，其和劳动者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推动劳资双方建立平等协商制度，也将是政府未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点。（2015年4月10日《南方都市报》南都）

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

现实中，当子女与母亲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只要拿出户口本就可以证明；当子女与母亲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必须有相关证明认同，否则，谁知道陈先生的妈就是他妈？

事实上，这暴露了公共信息服务存在短板。在公民的户籍、医疗、教育、生育等身份信息管理上，处于碎片化状态，信息不能共享，部门与部门之间又互设门槛，需要公民提供部门认为非常关键的证明，于是导致公民不得不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来回折腾。

“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但类似的麻烦却天天在上演。破解这个问题，政府服务要不断深化、细化和完善，并且要打破信息壁垒，实现部门之间“一网通”。（2015年4月10日《汴梁晚报》李冰洁）

美国为什么要博弈

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这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

美国之所以对加入亚投行持保守态度，是出于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因循守旧。国际金融秩序的架构，主要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二战结束后，凭借占据全球60%以上的黄金储备的实力，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双挂钩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在美国黄金储备已无力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又主导建立了牙买加体系，保证了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尽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之一，防范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明显不足，牙买加体系也被讥讽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但美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仍然行之有效。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结构等呼声态度迟疑，将原属欧洲发达国家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的提议迟迟不予通过，既失信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让欧洲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极力强调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以此防范新的国际金融力量取而代之。

美国的防范之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操阶段趋于炽烈。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就将取而代之。亚投行因此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但美国的这种做法，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中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布雷顿森林体系，源于二战后财富向美国的快速集中，以及美国当时拥有的特殊国家地位。这两个历史条件，中国都不具备。此外，亚投行的金融属性，也与世界银行不尽相同，更具有定向性。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觊觎者，而是其职能的补充者。可以说，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2015年3月23日《京华时报》徐立凡）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010）62809949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2806228 62805368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